

《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 编

风云七十年

FENGYUN QISHINIAN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国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998544

33*123

59/1

风云七十年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国





Fengyun qishinian

主编 郭德宏

王新生 赵自力 薛 钰
高远戎 王林育 任贵祥 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目 次

第一编 红色起点

一、从俄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振臂倡言赞“庶民”[3] 《新青年》初揭社会主义旗
[5] 毛泽东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10] 周恩来旅欧寻
真理[12]

二、中国历史新纪元

共产国际派他来中国帮助建党[14] 中国的第一支共产主
义火炬[17] 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21] 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23]

三、工农的觉醒

萧山衙前最早燃起的农运之火[26]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
做人！”[32] 二七大罢工亲历记[37]

第二编 大革命洪流

一、国共合作谱新篇

孙中山在苦闷中看到希望[55] 共产党走上国共合作之路
[62]

二、反帝怒潮连天涌

工人先锋顾正红[67] 五卅血溅南京路[71] 省港罢工
震中外[76]

三、北伐战争凯歌传

震撼全国的北伐战争[80] 铁军纵横谈[92] 如火如荼的湖南农民运动[99] 名垂青史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04]

四、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篡权的前哨战[112] 国共两党的分歧与斗争[120]

第三编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一、群雄并起齐暴动

贺龙与南昌起义[131] 八七会议始末[141] 霹雳一声暴动[146] 红旗高扬越王台[150] 朱毛雄师会井冈[152] 古田火炬照征程[163]

二、诱敌深入创奇迹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169] 排除干扰夺胜利[173]

三、艰难曲折的道路

周恩来与中共六大[180] 阶前白刃明如霜[185] 王明是怎样上台的[188]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三次等待[196]

四、铁流二万五千里

红军不怕远征难[208] 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214] 钢铁战士汇巨流[217]

五、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长征之后[220] “断头今日意如何”[229]

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毛泽东派我同十七路军谈判[236] 争取东北军的秘密战线[245] 民族曙光[254]

第四编 抗日战争的烽火

一、为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八一宣言》的发表[267] 潘汉年间关万里回陕北[268] 周小舟四次到南京[269] 董健吾携书赴陕北[271] 张子华宁陕穿梭行[272] 潘汉年舌战陈立夫[274] 西安城两党开谈判[275] 周恩来两上庐山[276] 重合作两党发宣言[278]

二、战斗在抗日最前线

洛川会议 红军改编[279] 云阳誓师 东渡黄河[281] 振奋人心的平型关之战[283] “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287] 太行高耸气森森[291] 西北屏障数晋绥[294] 抗日劲旅山西新军[297] 彭德怀和百团大战[300] 奋战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303] 决战黄桥[305]

三、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何白《皓电》 颠倒黑白[311] 朱彭叶项 驳斥谰言[312] 挥军北移 惨遭围攻[314] 揭露真象 举国声讨[316] 重建军部 坚持抗战[318]

四、战斗在雾重庆的周恩来和南方局

“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等待时机”[319] 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327] 广泛深入的统一战线工作[331]

五、整风运动与大生产

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337] 康生与“抢救运动”[346] 毛泽东视察南泥湾[348]

六、七大的光芒

七大的光芒[352]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355]

第五编 光明与黑暗的决战

一、挺进东北

奉命出关 挺进东北[363] 进驻沈阳,建立民主政权

[364] 曾克林飞赴延安,东北中央局成立[367]

二、谈笑凯歌还

为团结建国大计赴重庆[370] 人民的根本利益绝不放弃

[371] 统一战线更加扩大[374] 同毛泽东主席的一次

谈话[377] 胜利返回延安[381]

三、艰难的一九四七年

决策去留,毛泽东组建昆仑纵队[384] 三战三捷,真武洞

祝捷庆胜利[386] 千钧一发,王震率兵解重围[388]

小河运筹,三军协力捣中原[391] 首攻榆林,调动胡宗南

北援[394] 转守为攻,彭德怀歼敌沙家店[395] 扭转

乾坤——毛泽东吴堡渡黄河[397]

四、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巨流

有步骤地满足农民土地要求[400] 实行正确的路线和政

策[404] 土地改革与革命战争的胜利[406]

五、震撼世界的大决战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409] 雷霆万钧 夺取锦州[416] 淮

海战场上的总前委[422] 黄百韬兵团被歼记[429] 血

战双堆集,痛歼黄维兵团[436] 势如破竹 解放天津

[442] 争取傅作义与和平解放北平[448]

六、百万雄师过大江

渡江作战中荣膺先遣的第十五军[461] 红旗插上南京城

[466] 炮击英舰始末[468]

七、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日日夜夜

中共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472] 爱国民主人士响应“五一”号召[474] 迎接爱国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477] 米高扬秘访西柏坡[478]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481] 庄严的新政协会议[483]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487]

第一编 红色起点

- 一、从俄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
- 二、中国历史新纪元
- 三、工农的觉醒

点珠台珍 龍一葉

又主思京西下米穀園贈从 一
示於福多民園中 二
國堂治牙工 三

一、从俄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振臂倡言赞“庶民”

“胜利了！胜利了！”北京城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五色旗和各式各样的旗帜，高高挂起，随风飘扬。一场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战争，终于在1918年11月11日以德国方面的失败而宣告结束。由于一年多以前，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曾表示向同盟国的德、奥“宣战”，虽然没有派去军队，但也有在欧洲的华工去为协约国的军队修筑工事，于是，这时中国也就成了“战胜国”的一员了。“参战”年余，未出一兵一卒的军阀段祺瑞，也成了胜利的“英雄”，顿时就举行阅兵，吹吹打打，好不威武。曾经写下《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随后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梁启超，这时也在报纸上自吹自擂，竭力吹嘘自己“力主宣战”的汗马功劳。北洋军阀政府下了通知，为了庆祝胜利，14日、15日、16日3天，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

天安门前，搭起了临时的讲台，这是北京大学在筹办庆祝胜利的讲演大会。11月15日，演说会开始了，吸引了很多的听众。“公理战胜强权”，这是很多人演讲的内容。他们说的“公理”，就是指的协约国领导人提出的“正义”、“和平”、“人道”等等；强权，就是指的失败了德、奥等同盟国。“公理战胜强权”的说法对不对呢？现在庆祝的胜利，到底是什么人的胜利呢？这个问题

应当如何正确地回答呢？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做了精心研究的李大钊，稳步走上了天安门的讲台，用他那坚定有力的声音，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他满腔激情地向全中国人民宣告：“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还在7月初，李大钊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了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推动世界革命的巨大力量。现在，在《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中，他进一步宣传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开始向中国人民指出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他说：这次大战的结果，是“民主主义战胜”，“劳工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他号召人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上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做工啊！”

李大钊还写了长篇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交给《新青年》发表。在中国，是他第一次告诉人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是真正的革命的社会党，其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列宁的党要打破国家的界限，打破资本家的旧的生产制度。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阶级的战争，是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对全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李大钊高瞻远瞩，满怀信心地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的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和著名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光辉文献，是我国人民近百年来经历了千辛万苦、作出了无数牺牲后，终于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标志。

到了11月28日，北京大学又在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举办讲演大会。李大钊来到公园内，看到那里正在动工，竖

立所谓的“公理战胜”的牌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牌坊是用“克林德碑”改建的。这个克林德碑是为在中国死去的德国公使——一个德帝国主义分子而建立的。这个碑原来是建在崇文门的石牌坊。1900年，义和团神机八队章京恩海在崇文门西总布胡同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清朝政府为了讨好德国帝国主义，为他建了这个牌坊。现在德国失败了，这座耻辱的牌坊拆除了，人们把拆下的汉白玉移到了中央公园，建立新的牌坊。“克林德碑”四个字，变成了“公理战胜”。“公理”指的是什么？到底是谁的胜利？李大钊走上讲坛，再一次演讲了《庶民的胜利》，听众比上次更拥挤了，讲演赢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李大钊体会到，这两次讲演和最近写下的文章，就如同农民播种那样，在我国肥沃的土地上，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种子。他坚信这些亲手播下的红色种子，必能得到人民的培育，从而开放出灿烂的花朵。

（节选自黄真、姚维斗：《到底是谁的胜利？》）

《新青年》初揭社会主义旗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论文标志着李大钊成长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较李大钊晚了半年多，但他紧紧地跟上来了，而且当他一旦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地位和显赫的声望，他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又超过了李大钊。

“五四”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的确，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能与划时

代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只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陈独秀曾经崇拜的法兰西文明，及法国的民主制度，正是经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现在他如此地尊崇社会主义革命，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

1919年6月8日，他在《立宪政治与政党》、《吃饭问题》等文章中，明确地提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与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所谓“立宪政治与政党”，就是陈独秀曾经迷信过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及其政党。现在他不但不再迷信，而且认为都要成为过去的事了。他过去站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呼吁个性解放，现在却关注劳苦人民的生计问题，并把它看作“二十世纪臂头第一个大问题”，这反映了陈独秀的立足点开始转移，他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分手了。

6月11日，陈独秀被捕了。此后，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早在1917年7月回国时，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而《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报”，因此他在该报上“做的文字总不过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当他接办《每周评论》以后，“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他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于是，《每周评论》改变了它原有的政治方向。

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编辑成《杜威讲演录》专号，大肆散布实验主义。并在7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不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却去高谈

社会主义！……还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很明显，胡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

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同胡适展开了论战。李大钊首先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因此就需要“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工具，“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还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李大钊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经过群众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所以参加这次争论的人数很少，也谈不上谁胜谁负。这时陈独秀身陷囹圄，自然是没法参加这场论战的。这次争论说明了《新青年》同人面对五四时期各种外来的新思潮，可谓是见仁见智，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胡适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由他撰写的《实验主义》作为该号的带头文章。而李大钊编的第五号，则大部分内容是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原来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出现了裂痕。

陈独秀出狱以后，《新青年》开会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据周作人10月5日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这则日记没有写明有哪些人参加，“议”的什么“事”，但无疑和同人之间所抱主义之不同有关，否则为什么由几个人轮流编辑的《新青年》又改为由陈独秀“一人编辑”呢？又为什么陈独秀在七卷一号上发表《本志宣言》呢？而且《宣言》一开头便说：“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

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司意见，明白宣布。”

在“五四”以前，《新青年》虽不曾发表它的“具体的主张”，但那时同人之间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有差异也不过是主张的缓急不同罢了。现在发表《宣言》试图统一大家的主张，足见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宣言》也未必是经过大家讨论而一致同意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则是确定无疑的。

《宣言》明显地含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它攻击“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笔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主张“新时代新社会”不仅是“自由的平等的”，而且应当是“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并进而指明新社会的“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显然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期求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宣言》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言外之意，陈独秀有朝一日他将独树一帜，创立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综观《宣言》的全文，它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向共产主义者过渡时期的作品，也是《新青年》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的作品。《新青年》的发展以及它的性质的变化，基本上是与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同步前进的。这时，思想转变虽没有实现，但已经开始了。

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时候，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呈现一种中间性状态。它既保留有旧的因素，同时也孕育着否定旧因素的新因素。1919年11月12日，陈独秀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就正是他由资产阶级民主观向无产阶级民主观转变过程中的一篇典型作品。这是一篇专门论述民治（即民主）问题的文章。他说民治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应包含“政治和社会经济

两方面”，“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是狭隘的，对无产阶级而言，所谓自由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平等归结为在资产阶级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最重要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现在陈独秀想冲破资产阶级的这一狭窄的框框，把人权引入“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并首先着眼于政治的基础——社会经济。他不满意代议制，他认为“‘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他设想“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

在阶级社会里，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个不同的“民意”，是永远不能统一的。宪法，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或是双方势均力敌时的权力的法的表现，用宪法“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恰恰表现了陈独秀这时的阶级观点是相当模糊的。他认为在“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里，为实现民治而努力。还说：“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愿阶级争斗发生，……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社会天天在作恶。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陈独秀说：“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用，……”思想观点的摇摆、模糊，心情的惆怅，这都是在立场转变之时，所不可避免的。

但时过不久，陈独秀就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发言了。12月1日出版的《晨报》发表了他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说：“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他们“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劳动界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